

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的影响*

思特格奇 王映粲

内容提要：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思想对各国民族身份建构与国际关系都有深远影响。而在这两方面，拉丁美洲均显示出特殊性。拉美各国的族裔构成较为复杂，常缺乏“核心族群”。这导致在国内层面，拉美国家所形成的民族身份强调“混合”“多元”，同时因内部竞争而充满变动，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拉美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塑造了拉美国际政治的特点，即拉美各国受激进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较小，区域国际关系“对抗性”较少。具体而言，拉美区域相对较为和平，表现为战争数量少、烈度低；存在强大的泛民族主义；部分拉美民族主义者具有亲西方倾向或并不彻底反西方。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在于：民族身份的脆弱性限制了拉美国家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从而限制了战争的频率与规模；而民族身份的包容性则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此外，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特点抑制了分离主义的发展、防止族群冲突演变为国家间战争。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特点还使得拉美国家容易转向拉美区域、“西方”等更宏大的身份，并让拉美国家有足够空间强调自身与不同区域邻国、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

关键词：拉丁美洲 民族身份 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思特格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非洲与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映粲，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6-0105-28

* 本文系2023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青年项目“拉美左翼政府对美外交政策动向研究”（编号：2023QN06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第十二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暨第六届拉美研究与中拉合作协同创新论坛上宣读。感谢《拉丁美洲研究》编辑老师和匿名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陈积敏、谭道明、陈岚等学者对本文亦提出过宝贵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指导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民族和民族主义议题不仅是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政治学科的焦点。从国际政治视角出发，本文提出拉丁美洲国家^①民族身份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拉美国际政治的“非对抗”特性，并简要说明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特点影响拉美各国外交政策、区域国际政治的部分机制。

面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拉美国家面临建构民族身份的任务。但由于缺乏“核心族群”（Ethnic Cores）^②的复杂国内族裔构成情况，拉美各国所建构的民族身份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外交，使得拉美国际政治具有“非对抗性”的特点。具体而言，“非对抗性”的特征体现为国家间战争相对较少、区域存在泛民族主义、部分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国家的亲近和认同等现象。本文将从民族身份的角度，对上述现象的出现做出解释。

一 相关概念与文献评述

民族主义、身份等概念的内涵是复杂的。本部分将从研究需要出发，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从而说明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外交政策具有特殊性，与经典定义、一般现象间存在张力。由此出发，本文也提出，民族身份有潜力解释一系列拉美国际关系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民族主义”内涵多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进程、情感、语言和象征、政治社会运动或信仰与意识形态。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在这一概念的诸多含义中，“民族主义”的主要含义是一种“意识形态”。^③本文也选择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并认为这种思想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两重含义。

^① 本文中“拉丁美洲”主要指“伊比利亚美洲”（西语和葡语国家），不包含西半球的海地和其他英语、荷兰语加勒比国家。

^② “核心族群”是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民族国家往往围绕某一核心族群形成，详情参见后文。

^③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厄内斯特·盖尔纳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在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①。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可以适用于不同群体。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关注民族主义对特定民族的特殊意义，如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忠诚于本民族、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②，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致力于为一个被认为构成了民族的社会群体争取保持自治、统一与认同”^③。综合以上两方面，本文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主张以民族作为基本政治单元并要求捍卫本民族身份与利益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如上文盖尔纳的定义所示，在民族主义影响下，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将“民族”作为国家身份与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全体国民属于共同的“民族”（也作“国族”）。而由于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民族主义也重塑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随着民族国家兴起，外交政策所捍卫的国家利益也更多等同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民族自决、统一等议题。依据上述逻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明或暗地要求以民族分野为标准重划国家间疆界，从而为国际关系带来冲突因素。

“身份”概念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也需要做出界定。身份对应英文“identity”一词，亦有复杂内涵。身份一词可以表示社会类别、角色、基本信息、特性等含义^④，也可以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如霍格和艾布拉姆斯将身份理解为“人们对于他们是谁、他们是哪一种人、他们与他人关系的概念”^⑤。在本文中，“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是指对本国民族构成、本国何以构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② 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3年第5期，第18页。

③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4-65页。

④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22页；James D. Fearon, “What is Identity (As we now use the word)?”, November 3, 1999, pp. 4-6. <https://web.stanford.edu/group/fearon-research/cgi-bin/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10/What-is-Identity-as-we-now-use-the-word-.pdf>. [2024-04-10]

⑤ Michael A. Hogg and Dominic Abrams,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成“民族”乃至“民族国家”的认识，其功能在于向人民解释“是什么在文化、社会、政治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并将我们与民族之外的他者区分开来”^①。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本文将“national identity”理解为“民族身份”而非“国家身份”，是为了强调国家在民族主义时代面临着将自己整合为“民族”的压力。

民族身份有时也被翻译为“民族认同”。本文中，“认同”对应的英文是“identification”，与身份（identity）不同，两者含义也有区别。^②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从归属感、忠诚的角度理解国家认同，如林尚立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③。本文中也如此理解“认同”一词。因此，本文中的“身份”概念侧重认知层面，“民族身份”指对国家在民族层面本质属性的理解认知，而“认同”则侧重于情感层面，“民族认同”是指对特定民族身份的归属感。也可以说，身份是情感认同的对象，而普遍的认同则能够保证集体身份的稳定性。

（二）民族主义、民族身份视角下的拉美特殊性

在实践中，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常与特定的族群结合，并带有较强的对抗性（包括潜在的敌意与现实的冲突）。而在这些方面，拉美国家则表现出了不同。

1. 拉美国家缺乏“核心族群”

民族主义强调国家与民族的重合，但“民族”的定义也较为复杂。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和“族群”（族裔共同体）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民族是“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众文化，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相比之下，族群尽管与民族有相似性，但族群未必拥有一些政治性的元素，如族群不一定有公共文化、共同

^① Peter Lambert, “Myth, Manipulation, and Violen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Will Fowler and Peter Lambert (ed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9–20.

^② 关于身份、认同的内涵及其英汉翻译与争论，参见刘丰、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69–70页。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稳定的“身份”（identity），而仅存在多样的“认同、自我识别”（self-identification）。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 In Search of Oursel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7. 学界也倾向淡化“身份”与“认同”的差异，将“identity”翻译为“身份认同”。

^③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22页。

的经济体系与法律权利义务。^① 简言之，同时存在着更强调政治属性的“民族”和更强调血缘、文化的“族群”。

在实践中，族群成为民族身份的重要基础。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民族的形成往往以“核心族群”为基础，即一个单纯“以血缘和习俗为基础的共同体”。尽管“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多族裔的，但许多都是先围绕一个主体族群形成的，然后吞并或吸引其他族群或族裔碎片进入这个国家”^②。族群能有效地为民族的形成提供共同的神话、共同的历史记忆等有益元素，这使得以族群为核心建立民族的路径具有天然优势；同时，一些早期的“民族”，如英格兰人、法兰西人都建立在核心族群之上，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③ 纵观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后的历史，尽管多数国家的族裔构成仍较为多元，但不少多民族国家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苏联、南斯拉夫等纷纷解体，体现了在无核心族群情况下建构、维系国家的难度。

缺乏“核心族群”则成为拉美国家的特殊性。拉美地区是不同族群交融之处。^④ 根据大部分学者的估计，在前哥伦布时期拉美就生活着超过千万名原住民（印第安人）^⑤，尽管之后原住民人口因战乱、疾病、殖民统治而显著下降，但至今仍在拉美占相当比例。在殖民时期，西班牙、葡萄牙人大量到来并成为统治者，而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来自更多欧洲国家的移民也移居拉美。在殖民时期，拉美引入了大量黑奴，仅 1761—1860 年引入非洲裔奴隶的数量就达到两千多万人^⑥，使得非洲裔也成为拉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原住民、欧洲裔、非洲裔在漫长的历史上彼此跨族群婚育，催生了大量血缘复杂、多元的混血儿群体。白种人、原住民、非洲裔及大量混血居民在拉美广泛共存。根据墨西哥学者利斯卡诺·费尔南德斯所做的统计，到 20 世纪末，

^{①②③}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第 51—54 页，第 74—76 页。

^④ 在“族群”外，还有“种族”（race）这一概念。传统上，很多学者也强调拉美吸纳了“白人”“印第安人”“黑人”等不同“种族”。不过，“种族”这一概念与种族主义有一定关联，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社会建构而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参见 Peter Wade, *Race and Ethnicity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pp. 5—14。因此，本文除在引用相关历史概念外，不使用“种族”一词。

^⑤ 不同学者对前哥伦布时期拉美原住民人口数量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参见 [西] 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邓佩清译：《拉丁美洲居民简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9—53 页；[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林无畏、吴经训、孙铎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年，第 139—141 页。

^⑥ [西] 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邓佩清译：《拉丁美洲居民简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52—153 页。

在全部伊比利亚美洲人口中，原住民（印第安人）占比为 9.2%，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占比为 36.1%，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占比为 30.3%，穆拉托人（黑白混血）占比为 20.3%，黑人占比为 3.2%。具体到国别层面看，不同拉美国家的族群构成存在差异，但缺乏“核心族群”的情况却基本相似。利斯卡诺·费尔南德斯也从族群构成的角度，将拉美国家分为四类：在秘鲁、玻利维亚等国，人口的主要组成群体是印欧混血群体和印第安人；在巴西、古巴等国，白人和穆拉托人群体的占比最高；墨西哥、巴拉圭等国的主要人口为印欧混血人；只有在阿根廷、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国，白人人口的占比较高。^①可见，一部分拉美国家族群较为多元，国内不存在数量绝对占优的“核心族群”。而在以印欧混血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混血群体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核心族群”，其民族身份同样有待建构。

原住民等有色人种群体难以构成拉美国家的“核心族群”。在拉美国家中，原住民与黑人占比较高的国家本就较少，原住民群体仅在少数国家接近半数。拉美经委会的数据显示，只有玻利维亚的原住民人口超过全国人口半数，而在原住民比重第二高的危地马拉，原住民则仅占全部人口的 41%。^②此外，一些拉美国家原住民内部也存在差异，使其更难以构成各拉美民族国家的“核心族群”。例如，危地马拉尽管 90% 以上的原住民均为玛雅人，但仍可以进一步分为 20 余个不同语言群体。^③玻利维亚的原住民构成情况则更复杂：根据 2012 年的调查数据，玻利维亚原住民可以细分为 30 多个族群，其中占比较高的克丘亚人、艾马拉人在原住民中的占比分别为 45.6%、42.4%，没有哪一个印第安族群具有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④而在伊比利亚美洲各国，尽管在一些国家很多居民有非洲血统，但黑人（不包括黑人与其

^① Francisco Lizcano Fernández, “Composición Étnica de las Tres Áreas Culturales del Continente Americano al Comienzo del Siglo XXI”, en *Convergencia*, Vol. 12, No. 38, 2005, p. 228. 文中，作者区分族裔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关于拉美各国族群构成的情况，不同口径的数据也存在出入。

^② Cepal, “Los Pueblo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22 de Septiembre de 2014. <https://www.cepal.org/fr/infografias/los-pueblos-indigenas-en-america-latina>. [2024-07-20]

^③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Guatemala, “Resultados Censo 2018”, diciembre de 2019, p. 25, p. 28. <https://www.ine.gob.gt/centso-poblacion/>. [2024-08-02] 不过，危地马拉的人口主体并非玛雅人，而是被称为“拉迪诺人”（Ladino）的印欧混血人群。

^④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Censo Nacional de Población y Vivienda 2012”. <https://www.ine.gob.bo/index.php/censos-y-banco-de-datos/censos/>. [2024-07-20] 这一数据与拉美经委会的人口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异，认为玻利维亚原住民的比重低于 50%。

他族群的混血后裔)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则均较低。^①在白人较多的国家,也难以说“白人”构成了“核心族群”。以白人为主体的拉美国家往往都是移民国家,白人移民的来源也非常多元。例如,根据1914年的调查,阿根廷当时有1/3的国民出生于国外,其中39.4%来自意大利,超过了来自西班牙移民的比重(35.1%),来自俄罗斯、法国、奥匈帝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之和也接近10%。^②另外,在这些国家,很多自我认同为白人的国民可能也同时具有其他族群的血缘。虽然利斯卡诺认为哥斯达黎加在文化上由欧洲文化主导,但一些科学家的检测表明,哥斯达黎加国民的美洲印第安人基因占比也能达到30%以上。^③

2. 拉美国际政治罕有民族主义的“对抗性”

在实践中,民族主义及其塑造的民族身份一度给全球国际政治带来更多对抗(敌意与冲突)。从其宗旨看,民族主义有加深敌意、诱发冲突的一面。民族主义有着以本民族为优先的特殊主义倾向,容易导致各国为利益、地位、尊严而斗争。^④民族主义诱发冲突也有一些具体机制。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普遍要求实现民族的自治与统一,而这些诉求与既有的国家间疆界不乏矛盾,难免引申出分离主义、领土收复主义而带来冲突。也需看到,相比强调共同政治价值观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突出族裔身份的族群—文化民族主义(ethnocultural nationalism)往往更具对抗性。尽管文化民族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尊崇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但文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强调本民族的“纯粹性”与优越性,从而与沙文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有更强的联系。^⑤

^① Francisco Lizcano Fernández, “Composición Étnica de las Tres Áreas Culturales del Continente Americano al Comienzo del Siglo XXI”, en *Convergencia*, Vol. 12, No. 38, 2005, p. 228.

^② Vanina Edit Modolo, “Análisis Histórico - demográfico de la Inmigración en la Argentina del Centenario al Bicentenario”, en *Papeles de Población*, Vol. 22, No. 89, 2016, p. 212.

^③ B. Morera, R. Barrantes, and R. Marin - Rojas, “Gene Admixture in the Costa Rican Population”, in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Vol. 67, No. 1, 2003, pp. 71 - 80; Rebeca Campos - Sánchez, Henriette Raventós, and Ramiro Barrantes, “Ancestry Informative Markers Clarify the Regional Admixture Variation in the Costa Rican Population”, in *Human Biology*, Vol. 85, No. 1, 2014, pp. 721 - 740.

^④ Greg Cashman, *What Causes W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ond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4, pp. 221 - 230; 张旺:《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冲突及其化解》,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7期,第86页;梁雪村:《“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7 - 111页。

^⑤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Sixth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2017, pp. 174 - 176, pp. 182 - 187.

“民族身份”本身也有加深敌意而加强对抗的可能。如很多保守主义者所说，“身份”包含对不同群体的区分。亨廷顿表示，“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① 卡尔·施米特甚至认为政治的概念、观念、术语都包含“敌对性”，如果人们不能从国家等术语中“确切地知道要侵袭、战斗、反驳或否定的对象”，那么这些术语也根本无从把握。^② 由此看来，由民族主义塑造的身份往往潜在包含对其他民族的敌意。

相对而言，拉美国家外交政策、拉美国际体系则具有“非对抗性”的特点。这种“非对抗性”首先体现为拉美国家间的和平。从不同指标看，拉美国家都属于世界上较为和平的地区。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只有拉美和欧洲是独立主权国家较多的区域。而根据“战争相关性”（Correlates of War）数据库的统计，1823—1945年欧洲内部发生了约20次国家间战争，另有约22次欧洲国家与其他区域国家的战争；而在同一时段，拉美仅发生了约9次区域内的国家间战争，另有3次拉美国家与美国、西班牙的战争。在1945—2007年，拉美国家仅主要参与了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足球战争、英阿马岛战争和秘鲁—厄瓜多尔塞内帕战争3次战争，次数低于同期东亚—东南亚（8次）、南亚（5次）、中东北非（含阿富汗，13次）、欧洲及高加索（7次）、撒哈拉以南非洲（5次）、北美（8次）。^③ 在19世纪和20世纪，拉美平均每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3—24页。

② [德] 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③ 参见 Correlates of War, *COW War Data, 1816–2007 (v4.0)*.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cow-war/>. [2023–12–09]; Meredith Reid Sarkees and Frank Whelon Wayman, *Resort to War: A Data Guide to Inter-State, Extra-State, Intra-State, And Non-State Wars, 1816–2007*,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10. 这一数据库将战争分为国家间战争（Inter-State Wars）、国内战争（Intra-State Wars）、国家外战争（Extra-State Wars，涉及非国际体系成员的战斗）、非国家战争（Non-State Wars）。该数据库在统计“国家间战争”时，将“成为国际体系成员”作为界定国家的标准，所以一些亚非拉国家间早期的冲突没有被归入“国家间战争”，有些被归为“国家外战争”或“非国家战争”，如拉美各国独立战争等，这类战争本文没有统计。在统计时，本文也仅考虑战争的最主要参与方，而没有将哥伦比亚参与朝鲜战争、古巴参与安哥拉战争等计为拉美国家参与的战争。也有学者因统计方法不同，认为拉美的战争频率仅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参见 David R. Mars, “The Latin American Puzzles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mpir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89–396. 还有学者主张，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间战争的现象更集中于20世纪以来的南美洲。参见 Kalevi J. Holsti,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1–157; Félix E. Martí, *Militarist Peace in South America: Conditions for War and Peace*, 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8–9.

年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也远低于亚洲、北美及欧洲。在拉美国家普遍独立后,死亡人数占本国人口比重较高的战争也仅限于三国同盟战争、查科战争、足球战争等少数个案,并且没有出现独立国家因侵略征服而消失的情况。^①

在和平^②之外,拉美国际政治中的“非对抗性”还体现为较少的敌意与较多的友好和认同。一般而言,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邻国或前宗主国往往会被视为民族的“敌人”。然而,在拉美国家,民族主义有时并没有使不同国家陷入对立,反而很大程度上促使其团结联合。尽管不乏邻国间的矛盾,但整体而言拉美区域存在着较强的共同体意识,拉美区域长期、广泛地存在着主张区域团结乃至一体化的倾向^③,这种对拉美(乃至更大区域)整体性身份和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泛民族主义(也被称为“区域民族主义”“大陆民族主义”)。^④ 尽管拉美区域主义实践并不总是成功,但泛民族主义思潮却始终强韧存在,成为支撑拉美区域主义的重要因素。

尽管拉美民族主义存在着排斥西方的元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对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认同,甚至很多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对美国的情感认同。作为曾遭受殖民、侵略的一方,拉美国家民族主义对西方国家的暧昧态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特殊。尽管其中不时夹杂着幻想、妥协,但拉美国家的亲西方外交也体现出拉美外交非排斥、弱对抗的一面。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恩里克·罗多等拉美文化民族主义者就曾对与拉美有历史文化渊源的欧洲国家充满认同。罗多曾表示,“当讨论法国人时,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外国人加以讨论。……我们在法国看到拉丁灵魂的最高级绽放,几个世纪以

① Miguel Angel Centeno,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 - State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5 - 47;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1816 - 1980)*, Beverly Hills, London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 82 - 103.

② 和平并不完全等同于“非对抗”。有时,两国间未爆发战争只是理性算计的结果,并不代表没有战争的动机。因此,也有学者将和平分为“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与“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本文所说的“非对抗”与“积极和平”相似,既包含了少冲突,也包含少敌意。参见 Félix E. Martín, *Militarist Peace in South America: Conditions for War and Peace*, 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9 - 13; Kenneth E. Boulding, *Stable Peac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University, 1978, p. 3.

③ Salvador Rivera,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14.

④ 李紫莹:《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4期,第22-24页。

来，面对力量的狂溢与功利的诱惑，它在全世界守护着无私理想的庄严旗帜。”^①而在冷战期间，大量右翼民族主义者则强调拉美国家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支持本国站在美国一边。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阿根廷政府受右翼民族主义军人影响较大。在这一背景下，阿根廷大使在危机中表示阿根廷作为“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履行在泛美体系和里约条约中的承诺。^②

总之，在民族主义视角之下，拉美呈现出两重特殊性：即缺乏核心族群造成的民族身份特殊性与区域国际政治中“非对抗”的特殊性。本文认为，这两重特殊性彼此间也存在关联，前者影响并促成后者。一般而言，以特定族群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较为理想、更符合民族主义基本原则，但其进程往往伴随着国家间的对抗。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同样面临着建构“民族”身份的任务，需要以此支撑国家的合法生存。然而，拉美缺乏核心族群的国内现实与民族主义的抽象原则存在巨大差异。这种现实条件使得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建构相对脆弱但也更为包容，拉美国家的外交也受此影响而呈现更少对抗性的特点。

（三）理论视角下的“民族”与“非对抗”

本文关注“民族身份”对于拉美“非对抗性”的解释，具体涉及的“非对抗性”现象包括拉美国家间的相对和平、拉美的区域团结倾向与亲西方外交倾向。以上问题涉及战争与和平、区域主义、“选边站队”等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问题，既有文献也提出了众多解释。本文并不否认其他解释的价值，仅希望说明“民族身份”这一视角也能帮助理解拉美国家对外政策与区域国际关系的特点。实际上，“民族身份”视角也常常能与其他解释彼此贯通、相互印证。

关于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解释。在不同学者看来，拉美的相对和平可能源于拉美各国政府力量的不足、拉美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外部霸权国抑制战争、区域均势、国际规范、各国军事部门彼此间

^① José Enrique Rodó, “Discurso del Sr. José Enrique Rodó en Ocasión del Banquete Ofrecido a Anatole France, en los Salones del Club Uruguay, por Iniciativa de la Comisión Directiva de la Asociación de Estudiantes y de la Comisión Directiva del Ateneo de Montevideo”, en *Evolución*, Tomo 4, No. 30, 1909, pp. 93 - 96.

^② “Acta de la Sesión Extraordinaria Celebrada el 23 de octubre de 1962”, en Consejo de la OEA, *Actas de las Sesiones*, Vol. 42, julio - octubre 1962, pp. iii - 33. 转引自 Renata Keller,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eat Ones’: How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elped Resolv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51, Issue 4, 2019, pp. 8 - 9.

的共同身份、“外交实践共同体”的“习惯性情”(habitual disposition)等因素。^① 这些因素涉及国际、国内、物质、观念等不同层面,一些因素也与民族身份因素存在关联。

关于拉美区域主义的韧性和动力,有学者认为其应归因于拉美国家对政治自主(也包括区域大国对区域领导权的追求)和经济发展的追求(追求更大市场)、共同的文化与身份等因素。^② 一些学者也在对近年拉美区域主义实践的讨论中发现,拉美区域主义的一些实践源于特定思想、价值观的推动,而各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一致性也会影响拉美区域主义的兴衰。^③ 还有学者认为,基于文化、历史和规范的身份为拉美区域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也正因如此,在经济动因缺乏时,拉美区域主义仍能够发展。^④

无疑,分享经济利益、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等现实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部分拉美政府追随西方的现象。但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认同等因素拉近了拉美与西方国家关系。例如,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一方面指出拉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认为两者关系密切,甚至提出西方应推动拉美“西方化”、与西方结盟。^⑤ 英国学者安德鲁·赫里尔也认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制力之上,拉美

① David R. Mars, “The Latin American Puzzles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mpir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89–407; Arie M. Kacowicz, *Zones of Peace in the Third World: South America and West Af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89–124. 这两位作者的著述包含了对拉美相对和平的各种解释之合理性的深入讨论。

②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Introduc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 Linking Past and Present”, in Andrés Rivarola Puntigliano and José Briceño – Ruiz (eds.), *Resilience of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evelopment and Autonom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8–9.

③ Pia Riggirozzi, “Reconstructing Regionalism: What Does Development Have to Do with it?”, in Pia Riggirozzi and Diana Tussie (eds.), *The Rise of Post – hegemonic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London: Springer, 2012, pp. 17–39; David Baracaldo Orjuela and Jean – Marie Chenou, “Regionalism and Presidential Ideology in the Current Wave of Latin American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1, 2019, pp. 41–63.

④ Arturo Santa – Cruz,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n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Amitav Acharya, Melisa Deciancio, and Diana Tussie (eds.), *Latin America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163–181.

⑤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25页,第287页。

国家自视为西方的一部分也是其愿与美国结盟的原因之一。^①

总之，既有研究发现上述现象可能由不同因素导致，其中观念层面、国内政治层面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也为从“民族身份”的视角理解这些问题留下了空间。观念层面的因素如意识形态、区域文化令人将视线转向民族议题：政府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对本国民族身份的理解和认识，拉美国家共同的文化身份同样也建立在各国对本国族群构成与民族身份的理解之上。此外，国内政治因素常牵涉到民族身份：一国政府能力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族身份构建的成败，而不同政治、社会集团也会在建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彼此博弈。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身份可以提供一个串联起不同因素的视角，帮助理解拉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特点。芬兰学者萨卡里就曾借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的原住民“身份认同”因素解释其以反西方为特点的外交政策。^② 本文遵循这一路径，并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阐述：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存在一些共同特点，这造成了拉美国际政治整体的“非对抗性”。

传统上，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关注“身份”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民族身份”的解释视角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存在差异。“民族身份”的概念区别于建构主义学者更常用的“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主流的建构主义理论家往往强调身份的主体间性，强调国际体系、社会、过程、关系对于国家身份塑造的作用。他们所说的国家身份常指国家在国际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所属的集团。^③ 本文讨论的“民族身份”则是国家所拥有的更为基础的身份。一方面，确实是国际层面的压力使得拉美各国需要将本国建构为“民族”，但另一方面，民族身份的具体建构方式则更多取决于本国的特点和国内各界对自身民族构成的认识及彼此间的博弈，并不直接关乎一国与他国的关系。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温特曾将身份分为“团体身份”（corporate identity）与“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其中团体身份是“构成行为体个性的内在、自我组织的性质”，社会身份是“从他者视角出发，个体所赋予作为社会客体的

^① Andrew Hurrell, “Lat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 Robert O’Neill and R. J. Vincent (eds.), *The West and the Third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J. D. B. Miller*,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 155.

^② [芬兰] 萨卡里·林登：《原住民身份认同对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4期，第131-149页。

^③ Felix Berenskoetter,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ch 1, 2010, pp. 10-13. <https://oxfordre.com/internationalstudies/display/10.1093/acrefore>. [2024-03-15]

自己的一系列意义”^①。也就是说，本文讨论的“民族身份”属于国家身份中的团体身份，而建构主义者往往更关注社会身份。

二 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与脆弱性

由于复杂的族裔构成现实，拉美民族身份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拉美国家倾向把“混合”（meztizaje）“多元”（pluralism）作为本国民族身份的核心特点，而“混合”“多元”都有包容、接纳不同族裔的意味。同时，拉美的民族身份建构是持续的，甚至仍处于进程之中。拉美的民族身份在历史上存在变迁，至今也存在争议，其所建构的身份是脆弱的。

（一）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混合”“多元”

拉美地区存在着大量不同种族、族群及混血人口，缺少单一的核心族群。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建构采用了“混合”“多元”等路径。“混合”“多元”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尝试接纳不同血缘、文化的个体和群体，均将其视为新国家的一部分，由此具有“包容性”。

长期以来，“混合”是拉美精英构建民族身份的核心词。“混合”可以理解为不同种族、族群在血缘与文化上的交融。^②在建国之初，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建构中即有“混合”元素。整体上看，拉美国家早期的宪法试图包容不同族群。确实曾有一些拉美国家的早期宪法或明或暗地将原住民排斥在公民之外^③，但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大部分新近独立的拉美国家还是在宪法中规定人人平等，赋予土著居民平等的公民权，并都很快废除了奴隶制（巴西除外）。^④在19世纪，拉美国家尽管仍普遍存在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排斥，但大量政治家和思想家希望采取教育、贸易、通婚等手段，以融合、同化不同人种的方式将原住民和黑人融入国家，而非对其在政治和法律上做区别对待。

^①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1994, p. 385. 温特在之后又做了“个人/组织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集体身份”的划分。参见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228页。

^② Lourdes Martínez-Echazabal, “Mestizaje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 1845-1959”,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5, No. 3, 1998, p. 21.

^③ Jesús Luis Castillo Vegas, “El Estatuto Jurídico de los Indígenas en las Constituciones Hispanoamericanas del Período de la Emancipación”, en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No. 35, 2013, p. 432-439.

^④ Cletus Gregor Barié, *Pueblos Indígenas y Derechos Constitucionales en América Latina: Un Panorama (2a Edición)*, La Paz: Génesis, 2003, p. 81.

随着历史发展，“混合”对拉美民族身份的意义逐渐由一种工具手段转变为价值追求。19世纪上半叶，拉美政治家和学者在讨论“混合”时，常将其作为向欧洲文明过渡的工具，期望借其缓和种族矛盾、调整族群结构而为白人统治服务。但自19世纪后期开始，“混合”开始逐渐成为拉美民族身份更为核心、值得骄傲的特征。墨西哥学者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在1884年就提出，从打造种族同一性的角度，对于墨西哥而言，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人）相比白人更具优越性；他认为混血并不是实现欧洲化的中转站，其本身就是终点。^①古巴独立先驱何塞·马蒂则在其1891年的文章《我们的美洲》中肯定了美洲所独有的精神和文化，认为“无论欧洲的书本还是美国的书本，都不是西语美洲谜题的答案”；他使用了“我们的混血美洲”这一提法，将“混血”作为西语美洲的标志性特征。^②

进入20世纪，“混合”式的身份在拉美得到进一步理论化支持，也常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例如，尽管墨西哥思想家与政治人物巴斯孔塞洛斯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白人优越性并保留了对印第安人、黑人及其文化的强烈歧视，但他提出拉丁美洲的种族界限将消失，而最终形成完全混合的、保留各种族美好品质的“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巴斯孔塞洛斯甚至提出“混血使拉美优于北美”，认为拉美属于未来而拒绝混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逐渐属于昨天。^③作为墨西哥第一任教育部长（1921—1924年），巴斯孔塞洛斯领导了壁画艺术运动，组织大量画家在公共墙壁上进行创作，画作主题涉及墨西哥不同时期、不同族裔的历史文化元素。^④巴西学者吉尔伯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在20世纪30年代也阐发了相似的观点，他在《主人与奴隶》（亦作《豪宅与窝棚》）一书中强调了巴西人在宗教、音乐乃至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非洲印迹，认为即使没有非洲血统的巴西人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在他及同时

^① Vicente Riva Palacio, *México a Través de los Siglos* (Vol. 5), Mexico City: Editorial Cumbre, 1884, p. 471. 转引自 Regina Martínez Casas, et al., “The Different Faces of Mestizaje: Ethnicity and Race in Mexico”, in Edward Telles and The Project on Ethnicity and Race in Latin America (eds.), *Pigmentocracies: Ethnicity, Race, and Color in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 42.

^② José Martí, *Nuestra América*. <https://bibliotecavirtual.clacso.org.ar/ar/libros/osal/osal27/14Marti.pdf> [2024-03-15]

^③ 韩琦：《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与墨西哥的文化民族主义》，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十七辑），2021年，第142-150页。

^④ 王瀚生：《百年喧嚣：墨西哥壁画运动的起始、发展与当代回响》，载《油画艺术》，2022年第4期，第46-48页。

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每个巴西人都是身体或精神层面的混血儿。^①巴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精神,“种族民主”(racial democracy)的理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度成为巴西的某种“半官方意识形态”,很多巴西人以此为傲,认为巴西的族群关系更为和谐、平等,优于同时代的美国和欧洲。^②

同样地,“多元”也是众多拉美国家建构民族身份的重要途径。概括而言,文化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由不同族群组成,主张给予不同族群以平等的社会、文化权利。^③尽管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诞生较晚,但拉美历史上也存在符合多元文化主义精神的观念与实践原型。例如,在殖民时期,出于统治需要及一定程度上“保护”原住民的意图,西班牙统治者将部分原住民限制在与白人隔绝的村镇。这些村镇在西班牙统治下具有一定自治性质,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其中得以部分保留。^④在独立后,拉美各国官方长期倾向建立相对一元的民族身份,力图淡化国内不同族群在文化层面的差异。但自1987年尼加拉瓜制定新宪法开始,大多数拉美国家纷纷在宪法框架中赋予原住民集体性的社会、文化权利,部分国家甚至允许原住民群体采用较特殊的司法体系;在国际层面,各国也都签署了关于土著和部落人民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等旨在保护原住民的条约。^⑤此时,各国的官方民族身份都多少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重塑,强调本国在民族、族群层面的多元性,如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明确在宪法中确定了本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玻利维亚还在2009年更改国名为“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① Lourdes Martinez-Echazabal, “Mestizaje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 1845–1959”,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5, No. 3, 1998, p. 36.

② George Reid Andrews, “Brazilian Racial Democracy, 1900–90: An American Counterpoint”,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1, No. 3, 1996, pp. 488–496; 樊星:《如何理解巴西种族问题》,载《读书》,2020年第11期,第36页。

③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Sixth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2017, pp. 274–277; “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是相近的概念,但也有微妙差异,参见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31–34页。

④ Pablo Ortiz-T y Alberto Chirif, *¿Podemos Ser Autónomos? Pueblos Indígenas vs. Estado en Latinoamérica*, Quito: Imprimax, 2010, pp. 31–34; Jay Kinsbruner, *The Colonial Spanish–American City: Urban Life in the Age of Atlantic Capitalism*,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 41–45; José Antonio Aguilar Rivera, “Multicultu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in *Notre Da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Vol. 4, Issue 1, 2014, p. 33.

⑤ Christian Gros, “América Latina: ¿Identidad o Mestizaje? La Nación en Juego”, en *Desacatos*, No. 10, 2002, pp. 133–136.

（二）拉美民族身份的脆弱性：多变与竞争

在缺乏核心族群的现实条件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也是相对脆弱的：不同政治力量对拉美民族身份存在不同理解，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变迁。

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体现为存在多条彼此竞争的民族身份建构路径。这些不同的身份建构路径往往代表了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如19世纪中后期，大量拉美国家精英认为白人具有优越性，主张通过与白人婚育、引进白人移民的方式来“优化”民族，这种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身份建构路径对其他族群采取边缘化乃至敌视的态度。在处理与南方原住民马普切人的关系时，甚至有智利政治家提出灭绝马普切人的残酷主张。^① 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曾出现突出有色人种族群特性的身份建构路径。如在20世纪上半叶土著主义运动期间，著名左翼理论家、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提出“印第安美洲”（Indoamérica）的称谓，主张以此替代“拉丁美洲”。德拉托雷关注秘鲁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印第安人，认为印第安人的存在才真正反映了拉美国家的特殊性。^②

“混合”“多元”这两种身份建构路径存在竞争和对立。首先，即使排除掉“欧洲化”等极端的“混合”身份构建主张，拉美国家构建“混合”身份的历史实践仍保留了一定的歧视性元素，其对弱势族群文化的保护达不到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要求。例如，19世纪的拉美政府在将原住民个体视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之时，也通过占据土地等方式拆散了原住民的社群，恶化了其经济生活条件。^③ 又如在墨西哥等印欧混血或印第安人较多的国家，非洲裔群体往往比原住民遭受更多历史歧视，而“混合”身份往往意指印第安人与欧洲的“混合”，非洲裔依旧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厄瓜多尔有黑人在接受调研时抱怨，“我们是黑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梅斯蒂索（印欧混血）人，不可能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④ 也正是“混合”身份的以上弊端使得众多拉美国家在

^① Pilar M. Herr, *Contested Nation: The Mapuche, Bandit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le*,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9, pp. 101-104.

^② 谢文侃：《阿亚·德拉托雷的早期思想与其形成原因》，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十八辑），2022年，第257-258页。

^③ Cletus Gregor Barié, *Pueblos Indígenas y Derechos Constitucionales en América Latina: Un Panorama* (2a Edición), La Paz: Génesis, 2003, p. 81.

^④ Taunya Lovell Banks, “Mestizaje and the Mexican Mestizo Self: No Hay Sangre Negra, so There Is no Blacknes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disciplinary Law Journal*, Vol. 15, No. 2, 2006, pp. 199-234; Sarah Radcliff and Sallie Westwood, *Remaking the Nation: Plac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32.

20 世纪后期转向“多元”身份。此外，“混合”“多元”两种身份的建构方式还存在更深层的理念差异。“混合”身份主张淡化不同族群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者则认为混合身份在客观上掩饰了族群间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实际不平等，也抹杀了原住民、非洲裔等弱势族群的文化身份。^①

从时间维度看，拉美各国民族身份在历史上是多变的，在当前和未来也存在变数。总体而言，拉美各国对不同族群的民族身份的接纳和承认是渐进的过程。拉美社会自殖民时期开始就一直存在“混血”的现象，但早期的“混合”坚持欧洲文化主导，仅主张血缘而非文化的混合。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拉美才逐渐出现吸收不同族群文化、强调文化层面“混合”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到 20 世纪后期，“多元”身份开始在拉美兴起。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演化并非单向发展，“多元”未必就是最终、最优的结果。如前所述，“多元”与“混合”身份建构路径之间的争议至今仍存在于拉美。2022 年 9 月，智利的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而新宪法中含有进一步捍卫原住民权利、将智利塑造为多民族国家的主张。反对“多民族国家”概念的智利学者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国家主权，甚至带来地缘政治层面的争议。^②

三 民族身份塑造拉美外交与国际关系特点

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与脆弱性赋予了拉美国际政治与外交“非对抗性”的特征。本部分将对拉美民族身份特点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做出具体解释。

（一）拉美国际政治的和平性

如前所述，拉美区域国际政治相对和平，这体现为区域国家间战争数量少、冲突烈度较低。这些现象与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和包容性相关。

第一，如安赫尔·森特诺等学者所言，拉美国家间相对和平的重要原因

^① 樊星：《如何理解巴西种族问题》，载《读书》，2020 年第 11 期，第 37-38 页。

^② Universidad de Chile, “‘Sala Constituyente, Diálogos al Alero de La Chile’: Expertos Debaten sobre el Significado de la Plurinacionalidad en la Propuesta de Nueva Constitución”, 27 de julio de 2022. <https://www.uchile.cl/noticias/188585/debate-sobre-plurinacionalidad-en-seminario-de-uchile-constituyente-.> [2024-05-05]

是各国国家能力相对有限，国内斗争本身限制了战争的发动。^① 拉美各国国家能力的弱势也部分源于民族身份的脆弱性。据森特诺统计，到20世纪末，涉及拉美的国际战争不到30场，而拉美各国的内战则超过60场。^② 这些冲突大量涉及族群间冲突，是民族身份脆弱的体现。例如，在19世纪，巴西国内不时出现黑人奴隶起义；阿根廷和智利与各自国土南方的原住民发生冲突，由此向南开拓疆域；墨西哥、中美洲诸国和哥伦比亚国内政治斗争中族裔的成分相对有限，但在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内战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矛盾的焦点在于对天主教的态度，这一问题同样与国家的文化身份紧密相联。甚至到20世纪，中美洲的游击战争也有很强的族裔因素：在80年代的国内战争中，危地马拉军政府在对左翼武装的同时还对国内玛雅人进行了屠杀；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对者中也有一批较为特殊的、讲英语而不愿融入尼加拉瓜西语社会的印第安原住民。^③ 这些内部冲突使得执政者难以在国际层面投入更多精力，更无力对他国发动战争。^④

第二，国内族群矛盾导致的民族身份脆弱性限制了国家间战争的规模。一方面，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身份的民众基础一度薄弱，大量有色人种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排除在政治社会生活之外，他们享受不到公民的权利，也很难在战争中被动员。^⑤ 由于各国都有相当比例人口被排除在战争之外，战争也就难以成为全民参与的、残酷的总体战。另一方面，由于不愿激发国内族裔间冲突，对外战争令拉美国家颇为忌惮。对外战争常带来国内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调整的结果，这是拉美各国既得利益者想要避免的。在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中，巴西帝国由于兵源不足而招募黑人奴隶士兵参战。

① Miguel Angel Centeno,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 - State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61 - 280;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 - 245页。

② Miguel Angel Centeno,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 - State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4 - 46.

③ [美] 林恩·福斯特著，张森根、陈会丽译：《中美洲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第281 - 283页。

④ 与族群相关的内部冲突在拉美国家建国初期尤为严重。在当代拉美，与族群相关的内部冲突频率与数量有所下降，并且拉美地区严重的民族分离运动也较为罕见。参见 Tomasz Rudowski and Piotr Sieniawski, "Latin America: The Region without Catalonia",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 Vol. 25, No. 1, 2020, pp. 115 - 119.

⑤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作为交换，这些参战黑人可以成为自由人，这在当时面临很多争议，很多奴隶主不愿承认被解放黑奴的公民身份。有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加剧了巴西国内分歧，从而促进了巴西在废除奴隶制等方面的改革。^① 在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的太平洋战争中，当智利军队进入秘鲁领土后，很多秘鲁印第安人自发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抗，从而引发了秘鲁精英对印第安人力量发展的担忧，于是选择与智利和谈。^② 对这些秘鲁精英而言，向智利割让领土的损失要小于觉醒的原住民力量对当时白人主导的民族身份的冲击。

第三，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与包容性限制了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国际冲突。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统一的理念，常会让部分国家支持邻国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同族同胞，从而使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国家间冲突。^③ 例如，在19世纪、20世纪的欧洲，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后更名奥匈帝国）内部民族众多，因此与寻求民族统一并希望吸纳其领土和人口的意大利（及其前身撒丁王国）和塞尔维亚爆发战争。然而，在拉丁美洲，各种主流的民族身份都没有稳定地以特定“核心族群”为基础，少数有跨国民族认同的族群往往也难以寻找强力外援，甚至反而会遭到各方的打压。^④ 例如，马普切人喜爱使用“瓦尔马普”（Wall Mapu）这样一个传统民族概念指代马普切人生活的传统家园，这一地理概念跨越了阿根廷与智利。结果，当智利左翼政府官员在2022年使用这一概念时，就遭到了较为敏感的阿根廷与智利保守人士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分离主义倾向，挑战了两国国家主权与现有民族身份。^⑤

①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徐守源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从独立到大约1870年》（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19-820页。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巴西黑人入伍对废奴的重要刺激作用。参见 Hendrik Kraay, “Slavery, Citizenship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Brazil’s Mobilization for the Paraguayan War”, in *Slavery & Abolition*, Vol. 18, No. 3, 1997, pp. 228-256.

②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胡毓鼎、高晋元、涂光楠等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约1870—1930》（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99-601页。

③ 杨迪、漆海霞：《族群冲突背景下的外国军事干涉》，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146页。

④ 拉美也存在少数例外，如在19世纪的墨西哥，该国寻求脱离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美国移民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成功实现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与最终并入美国。参见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7-35页。

⑤ “‘Wallmapu’: El Término Mapuche que Usa el Gobierno de Gabriel Boric en Chile y Encendió las Alertas en la Argentina”, *La Nación*, 31 de marzo de 2022. <https://www.lanacion.com.ar/el-mundo>. [2024-08-08]; 吴孙沛璟：《“瓦尔马普”：一场激烈的争辩与一段被忽视的历史》，澎湃网，2022年4月22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89882. [2024-08-08]

此外，在当代拉美，相对包容的民族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族分离主义，进一步降低了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国家间战争的可能。例如，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玛雅印第安人密切相关，但其强调自身的墨西哥属性，希望玛雅人能在其民族特性得到承认的前提下融入墨西哥，而不寻求从墨西哥分离。^① 在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不同的印第安人运动有不同的国家身份诉求，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MAS - IPSP）强调玻利维亚国内的多元性，而费利佩·奎斯佩（Felipe Quispe）领导的原住民运动则强调玻利维亚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差异，甚至希望艾玛拉人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治体。无疑，这两股原住民政治力量在理念与现实层面都存在政治竞争。最终，莫拉莱斯带领更温和的力量在2005年赢得大选，奎斯佩则只能长期作为反对派活动，这也体现出分离主义身份诉求面临“多元”身份的有力压制。^②

第四，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与包容性也能增加各国间的认同感而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由于族群结构的相似，拉美各国难以建立完全区别于他国的身份，从而也就难以出现常常与民族主义相伴的针对“敌人”的仇恨，杀戮、征服、奴役敌人无法成为公众可接受的目标。也正因如此，如前文所述，大多数拉美国家间战争造成的伤亡也相对较少。^③ 从太平洋战争中智利、秘鲁的官方宣传里，可看出拉美国家间战争的特殊一面。在战争期间，智利和秘鲁都有意夸大彼此的族裔构成差异，如秘鲁人在宣传中将智利人称为“阿劳坎人”。^④ 但由于在语言、文化上的相似性，且两国实际都是融合了不同族群的国家，双方依然不能完全通过民族间的仇恨去动员士兵。结果在战

① “Autonomía y Nacionalismo Zapatista”, Radio Zapatista, 21 de septiembre de 2008. <https://radiozapatista.org/?p=339>. [2024 - 08 - 12]; “Autonomía y Nacionalismo Zapatista”, Enlace Zapatista, 1 de enero de 1995. <https://enlacezapatista.ezln.org.mx/1995/01/01/tercera-declaracion-de-la-selva-lacandona/>. [2024 - 08 - 12]

② Edwin Cruz Rodríguez, “Los Movimientos Indígenas y la Cuestión Nacional en Bolivia y Ecuador: Una Genealogía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en *Análisis Político*, Vol. 23, No. 70, 2010, pp. 145 - 146.

③ 三国同盟战争相对例外，巴拉圭在战争中损失了极高比重的人口。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巴拉圭的人口相对同质化，西班牙殖民者与土著瓜拉尼人混合形成的文化、语言塑造了区别于邻国的民族身份，使得巴拉圭人战斗意志更强，战争也由此格外残酷。参见 Thomas L. Whigham, “The Paraguayan War: A Catalyst for Nationalism in South America”, in Hendrik Kraay and Thomas L. Whigham (eds.), *I Die with My Count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guayan War, 1864 - 1870*,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pp. 180 - 183.

④ 阿劳坎人即“马普切人”，是智利南方的原住民族。实际上智利的白人人口比重远高于原住民所占比重，但当时的秘鲁精英群体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有意将“阿劳坎人”作为对智利人的贬称。

争中，智利一方的宣传更多诉诸自身长期稳定、少有动荡的政治传统，将自己塑造为“文明”的一方。智利方面强调本国有权惩罚“野蛮”的邻国，认为智利将为其带来秩序与进步，甚至是在拯救战败者。而秘鲁方面则渲染智利军队的劫掠和破坏，指责智利的“野蛮”，认为自身才属于文明国家。智利的一些宣传甚至将秘鲁称为“脱离正道的兄弟”^①，“兄弟之争”的表述也让战争中的零和性相对较弱。从这些宣传可以看出，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确实难以完全将自身区别于邻国，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中难以出现过多民族层面的仇恨。

（二）拉丁美洲强大的泛民族主义

拉美强劲的泛民族主义背后有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特点的推动。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与泛民族主义的强势可以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如国际关系建构理论所主张，“同质性”有助于建立集体身份，使得不同行为体相互视为同类，认同他者而将他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② 拉美国家内部因缺乏单一核心族群而缺乏“同质性”，但各国间却因存在跨国的族群、语言、文化联系而存在“同质性”。这导致拉美各国区别于邻国的民族身份构建相对艰难，而区域层面的集体身份则顽强存在。

拉美国家因缺乏核心族群而导致民族身份脆弱。同时，拉美不同族群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与政治隔阂，族群身份与国家层面的民族身份存在竞争。在国际关系学者埃斯库德看来，拉美国家具有内部异质性，如秘鲁与厄瓜多尔都有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山区与以混血人种为主的沿海地区，两者在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③ 这种族群层面的异质性往往催生不同的群体身份，从而削弱共同的民族身份。由于对原住民出身的莫拉莱斯总统的资源政策不满，在以白人和印欧混血群体为主要居民的玻利维亚东部省份，当地精英在2008年曾一度提出要求实行区域自治。^④

^① Juan Carlos Arellano González, “El Pueblo de ‘Filibusteros’ y la ‘Raza de Malvados’: Discursos Nacionalistas Chilenos y Peruanos durante la Guerra del Pacífico (1879 - 1884)”, en *Diálogo Andino*, No. 48, 2015, pp. 71 - 83.

^②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第342 - 345页。

^③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7, pp. 42 - 43.

^④ 杨靖：《资源开采与央地冲突：以玻利维亚东部省份抗争为案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3期，第131 - 153页；徐世澄：《玻利维亚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载《世界民族》，2012年第6期，第21 - 22页。杨靖也指出，在族群因素外，东部省份与中央政府的冲突还涉及经济利益分配等因素，东部精英尝试建立一种超族群的地域性身份。

在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相对脆弱的情况下，很多拉美国家民众的民族认同难免向高于国家的共同体转移。在拉美各国内部存在族裔差别的同时，拉美不同族群都很容易在邻国发现与自己血缘、文化相近的伙伴。如埃斯库德所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更像乌拉圭人而非阿根廷北部的科连特斯省人；科连特斯省人与西北部胡胡伊省人的相似性，则不如其与巴拉圭人的相似性；胡胡伊省人相比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省人，更像玻利维亚人；门多萨省人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相比，则更像智利人。^① 因此，不同的拉美族群都有认同区域同族而不仅是本国同胞，甚至存在认同区域同族而排斥本国同胞的现象。19世纪拉美精英往往排斥原住民与黑人，但这些保守人士如多米尼加的弗朗西斯科·穆尼奥斯（Francisco Muñoz del Monte）也呼吁实行区域联合^②，实际上是主张拉美各国白人的联合。原住民群体间也会存在跨国的共同身份：智利与阿根廷的马普切人同族会有跨国的联合政治、社会运动，一些民族精英与相关组织也在尝试为各国马普切人设计共同的旗帜与字母表。^③ 这些组织希望借助其他区域力量解决本族群与国家的争端。例如，马普切人组织曾希望玻利维亚原住民出身的总统莫拉莱斯帮助其在联合国大会上传递信息，并借此与区域组织南美国家联盟展开对话。^④ 此外，拉美区域也存在像亚马孙河流域原住民协调机构（COICA）这种吸纳9个区域国家、500多个原住民群体代表的庞大跨国组织。^⑤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还体现在民族特征与区域特征的重合，因此旨在构建、强化民族身份的主张和行动往往会加强区域身份。在历史上，拉美各国通过普及通用语言等方式试图加强国内的同质性、吸纳不同族群，然而，越是采取这类政策，拉美国家间特别是西语国家间的差异也就愈发模糊。

① Carlos Escudé, *Foreign Policy Theory in Menem's Argentina*, Gainesville,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7, pp. 42 - 43.

② Salvador Rivera, *Latin American Unificatio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Efforts*, Jefferson, North Californi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14, pp. 15 - 16.

③ “Los Mapuches de Chile se Unen a los de Argentina y Preocupan al Gobierno”, La Política Online, 15 de enero de 2017. <https://www.lapoliticaonline.com/nota>. [2023 - 12 - 20]; Sarah Wallren, “A Nation Divided: Building the Cross - Border Mapuche Nation in Chile and Argentina”,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45, No. 2, 2013, pp. 250 - 257.

④ “Mapuches se Reúnen con Evo Morales y Piden que Lleve Mensaje a Conferencia de la ONU”, Nodal, 19 de junio de 2014. <https://www.nodal.am/2014/06>. [2024 - 08 - 02]

⑤ Coordinadora de las Organizaciones Indígenas de la Cuenca Amazónica, “¿Quiénes Somos?”. <https://coicamazonia.org/quienes-somos/>. [2024 - 06 - 02]

另外，试图借外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举措常常将不同拉美国家联系在一起。拉美国家往往强调自身与美国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而这同时也突出了拉美国家间的相似性。因此，前文所述的何塞·马蒂、罗多等主张对抗美国扩张的拉美民族主义先驱也都是拉美国家联合的支持者。

拉美国家构建“混合”“多元”民族身份的尝试，亦因其包容性而拓宽了泛民族主义的内涵。由于西语、葡语国家或多或少都是“混合”“多元”的，这种身份建构路径同时也淡化了西语国家与巴西的差异，为其联合注入动力。巴斯孔塞洛斯在宣扬融合各种族血液的“宇宙种族”时，并未单独强调他的祖国墨西哥，而是把包括葡语国家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作为谈论对象，骄傲地把他所见到的巴西城市的繁盛景象作为未来混血的“完美种族”的榜样。^①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对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丰富，泛民族主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拉丁美洲国家在近几十年里逐渐与语言、文化不同的加勒比国家进行区域主义合作，产生了兼容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的区域组织，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拉美左翼领导人也将这些组织与“大祖国”挂钩。^②传统上，委内瑞拉这样的西语国家与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联系较少，相互之间存在矛盾^③，查韦斯之所以愿意拉近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除了出于对抗美国的地缘诉求和左翼传统的国际主义热情外，也与委内瑞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有关。查韦斯在国内一再提高原住民、非洲裔的政治地位，并公开强调他本人的原住民、非洲裔血缘与相貌特点，试图使得不同有色人种族群都成为委内瑞拉民族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④尽管委内瑞拉等加勒比国家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差异较大，但在拥有非洲裔人口方面却有相似性。就此而言，多元文

^① David A. Brading, “Nationalism and State -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in *Ibero - amerikanisches Archiv*, Vol. 20, No. 1/2, 1994, pp. 99 - 100; José Vasconcelo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idier T. Jaén, *The Cosmic Race* (A Bilingual Ed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 巴斯孔塞洛斯将巴西纳入拉丁美洲的范畴，也是因为葡萄牙与西班牙有历史、文化联系。

^② “Chávez en la Celac (+ Mensaje)”, *Cubadebate*, 28 de enero de 2013. <http://www.cubadebate.cu/noticias/2013/01/28/chavez-en-la-celac/>. [2024 - 08 - 20]

^③ Max Römer Pieretti, “Venezuela a partir de Chávez: Identidad Cultural y Política”, en *Historia y Comunicación Social*, Vol. 19, No. Esp., 2014, p. 62; José Antonio Hernández Macías,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Venezuela en el Caribe”, en *Cuadernos Americanos*, Vol. 1, No. 155, 2016, p. 151.

^④ Barry Cannon, “Class/Race Polarisation in Venezuela and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Hugo Chavez: A Break with the Past or 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4, 2008, p. 741.

化主义的身份观无疑拉近了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的心理距离，可以在彼此间建立共同身份，从而拓展了区域泛民族主义的内涵。

（三）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暧昧关系

尽管西方国家常被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视为敌人，但拉美外交思想与实践却兼有反西方与亲西方倾向。尤为特殊的是，拉美外交的亲西方倾向并非完全是政治投机者对西方的屈从，也并非完全出于依附强者以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很多拉美民族主义者也是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与拉美国家的泛民族主义产生的机制相似，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赋予其与西方国家的“同质性”乃至共同集体身份，造成了某些情况下拉美国家“亲西方”的现象。

由于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在国内不同族群的竞争中，总会有部分拉美人尝试利用拉美的欧洲血统和文化遗产建构本国的民族身份。这可以解释拉美国家外交中存在的稳定的亲西班牙倾向。20世纪40年代，亲轴心国的阿根廷庇隆政府在与美、英对立的同时，开始强调与西班牙的共同历史、文化和宗教，将西班牙称为“母国”。20世纪60年代末上台的阿根廷独裁者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则更为激进，他在会见西班牙官员时强调自己的巴斯克家系，认为阿根廷与西班牙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表示希望西班牙帮助阿根廷建立“阿根廷民族性”与民族精神。^①当然，由于国内政治斗争、不同力量对西方国家认识不同，拉美各国对西方的认同政策也总面临挑战。庇隆政府与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关系很快因双方在阿根廷独立英雄圣马丁、西班牙在拉美历史中的作用等议题上产生争执，两国关系的蜜月期迅速结束。^②墨西哥也经历了相似的情况：在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被视为外敌，而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期间（1867—1911年），墨西哥政府希望西班牙移民帮助本国发展经济甚至实现墨西哥人口的“白化”，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受到欢迎和优待。随着墨西哥大革命推翻迪亚斯统治，墨西哥开始更重视

^① Daniel G. Kressel, “The ‘Argentine Franco’?: The Regime of Juan Carlos Onganía and Its Ideological Dialogue with Francoist Spain (1966–1970)”, in *The Americas*, Vol. 78, No. 1, 2021, pp. 89–117; Raanan Rein, “Peronist Nationalism and the Hispanic Heritage in Argentina”, in Moshe Gammer (ed.),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State: Comparing Africa, Eur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74–86.

^② Raanan Rein, “Peronist Nationalism and the Hispanic Heritage in Argentina”, in Moshe Gammer (ed.), *Community, Identity and the State: Comparing Africa, Eur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74–86.

国内前哥伦布时期的历史遗产和印第安人元素，西班牙人则作为前政府的优惠对象再度遭到仇视。在之后的历史中，不同阶层、群体对西班牙人有着不同看法，接纳西班牙内战流亡者、纪念西班牙“发现”美洲 500 周年等政策和行动都在墨西哥国内引发过争论。^①

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促使拉美国家认同于其他更模糊的宏大集体身份，从而拉近了与美欧的关系。拉美国家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民族身份，也就使得“美洲”“西半球”“西方”等更宽泛的概念对自身产生吸引力。美国作为美洲国家的身份使得很多拉美人对其产生亲近感。对于 1823 年美国提出的要求欧洲国家不得干涉、殖民西半球国家的“门罗主义”主张，当时有一部分拉美政府予以欢迎^②，实际上也认可了美国作为美洲一员发声的资格。在 19 世纪 50 年代，在尼加拉瓜立国未久、国内政治极为分裂的情况下，反政府一方曾积极将美国“冒险家”作为定居者引入本国，甚至有人提出这些冒险家是“兄弟、同一个大陆的儿子，受同样的原则所激励，由共同祖国建立的秩序与自由的高贵愿望所驱动”。^③近年来，右翼保守主义政治人物如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则表现出对美国保守力量的亲近。博索纳罗在访美时流露出对美国的欣赏，曾表示美国和巴西将共同致力于保证尊重家庭传统、敬畏“造物主”、反对性别意识形态、反政治正确、反对假新闻等方面的自由。他从特朗普与美国共和党身上找到了传统“西方”这一集体身份。^④

与此相似，法国所倡导的“拉丁民族”身份也一度让很多拉美人深为着迷。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利用“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宣扬法国与拉丁美洲人同属“拉丁种族”，借此为自身干预、殖民拉美的企图服务。在 19 世纪的一系列美墨冲突后，很多墨西哥保守派对美国的抵触催生了亲法思想：他

^① Pilar Gil Tébar,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in and Europe in Iberian America: The Case of Mexico”, in David González Cruz and Pilar Gil Tébar (eds.), *Nationality and European Identity in the Hispanic World*, Madrid: Biblioteca Nueva, 2019, pp. 277 – 292.

^② Joseph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776 – 20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7 – 18.

^③ William Manning (ed.),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 – American Affairs, 1831 – 1860*, Vol. 4,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34, pp. 264 – 268. 转引自 Michel Gobat, *Empire by Invitation: William Walker and Manifest Destiny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8 – 49.

^④ “Declaração à Imprensa do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Jair Bolsonaro, durante Conferência de Imprensa com o Presidente dos Estados Unidos, Donald Trump – Washington/EUA”, Biblioteca Presidencia, 19 de março de 2019. <http://www.biblioteca.presidencia.gov.br/presidencia/ex-presidentes/bolsonaro/discursos>. [2024 – 05 – 05]

们将墨西哥与美国的冲突视为“拉丁种族”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天主教与新教的对抗，认为法国作为拉丁种族所拥有的最强大国家，理应同情和支持墨西哥。^① 加上对法国君主制的推崇，与尼加拉瓜自由派在内部冲突中引入美国力量相似，很多墨西哥保守派也成了19世纪60年代法国干涉墨西哥、扶植傀儡政权的合作者。甚至到一战时，很多拉美知识分子对法国投注了感情，除对法国政治传统的偏爱之外，很多人支持法国还因为将这次世界大战视为“拉丁种族”与“日耳曼种族”“条顿种族”的冲突，主张本国应支持同属“拉丁种族”的法国。^②

由于“混合”“多元”的包容性，拉美的西方渊源甚至给具有反殖民传统的拉美左翼带来了部分亲近西方国家或至少弱化其“反西方”政策的理由。这不意味着拉美左翼因民族身份而彻底放弃与西方在各种问题上的对立，而是说持多元包容身份观的拉美左翼人士削弱了其反西方的程度或至少调整了针对西方的策略、措辞，为其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提供了一定空间。由于对“多元”的推崇，拉美左翼政府常谈及拉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联系，承认西方民族、文化是自身身份的来源之一，将其作为一种促进国家间友好的外交资源。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在访问西班牙时，就提到“西班牙是古巴民族性的来源之一，是古巴‘酱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与此类似，巴西左翼总统卢拉也与葡萄牙保持了良好关系。他在2003—2010年担任总统期间，曾六次因不同事由出访葡萄牙。^④ 在2023年再次担任总统后，卢拉于当年4月就访问葡萄牙，他在此次访问中表示对巴西人而言葡萄牙并非“外国”，葡

① Edward Shawcross, *France, Mexico and Informal Empire in Latin America, 1820-1867: Equilibrium in the New World*,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35-145.

② Stefan Rinke,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W. Rei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86-87.

③ “España es Parte Indisoluble del ‘Ajiaco’ de Nuestra Nacionalidad”, Granma, 14 de noviembre de 2019. <https://www.granma.cu/discursos-de-diaz-canel/2019-11-14>. [2024-02-20] 古巴传统菜肴“酱汁”(Ajiaco)，是混合不同食材而炖成的汤，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曾用其比喻古巴民族构成的“混合”特性。参见 Miguel Arnedo, “Arte Blanco con Motivos Negros: Fernando Ortiz’s Concept of Cuban Na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20, No. 1, 2001, pp. 88-90.

④ “Viagens”, Biblioteca Presidência da República. <http://www.biblioteca.presidencia.gov.br/presidencia/ex-presidentes/luiz-inacio-lula-da-silva/viagens/viagens-1>. [2024-08-10]

葡萄牙与巴西对于两国人民而言都是彼此“家的延伸”。^①

包容的身份观甚至给拉美左翼与美国之间增添了某种缓冲。由于美国与拉美国家都由不同族裔构成，有不同程度反美倾向的左翼人士也难以在文化、族裔层面彻底否定美国。委内瑞拉的左翼总统查韦斯曾在接待美国少数族裔代表团时表示，其政府将捍卫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非洲裔的权利。^②这一表态包含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批评，但实际也承认了委内瑞拉与美国因均有非洲裔居民而存在人文联系。查韦斯甚至一度希望利用奥巴马执政的机会改善两国关系，并特别关注奥巴马的黑人身份。在奥巴马刚刚当选不久，他曾在电视演讲中表示，“从现在开始，我向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位黑人发出信号，从这里（发出）我们这些黑人种族、南美种族希望世界和平的信号。”^③

四 结语

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拉美国家需要建立自身民族身份以维系国家合法性，但“一族一国”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与拉美国家的族群现实情况有较大差距。基于各自现实，拉美国家在曲折中建构了兼具脆弱性与包容性的民族身份，导致拉美人在本国民族身份与其他身份间游移。不过，由于拉美民族身份的特点，拉美国家更多地内部消化了民族建构进程中的痛苦，而没有在国家间出现过多血腥冲突，也未陷入民族间相互仇恨的渊藪，让区域国际政治呈现出“非对抗性”。

在价值层面，拉美案例的特殊性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民族国家的绝对性与民族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与全球化相伴，当今很多相对成熟的民族国家再次受到民族身份问题的拷问。此时，值得结合拉美经验思考如何

① “Pronunciamento do Presidente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Após Encontro com o Primeiro - ministro Português, António Costa”, O Planalto, 24 de abril de 2023. <https://www.gov.br/planalto/pt-br/acompanhe-o-planalto/discursos-e-pronunciamentos/2023>. [2024-06-05]

② “Chavez Courting U. S. Minority Groups”, NPR, January 10, 2006. <https://www.npr.org/2006/01/10/5147362/chavez-courting-u-s-minority-groups>. [2024-06-05]

③ “Chávez Buscará Dialogar con Obama para Restablecer Relaciones con EE. UU.”, El Universo, 3 de noviembre, 2008. <https://www.eluniverso.com/2008/11/03/0001/14/>. [2024-08-12] 尽管查韦斯和奥巴马最初都表露出修复两国关系的意愿，但由于两国矛盾深重，最终查韦斯也多次对奥巴马进行严厉指责。参见 Javier Corrales and Carlos A. Romero, *U. S. - Venezuela Relations Since the 1990s: Coping with Midlevel Security Threa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99-106.

完善民族身份。一方面，应重视拉美国家的教训与经验，妥善协调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避免族群间纷争削弱统一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应处理好一国特殊民族身份与国际社会成员身份的关系，避免因过于僵硬的民族身份造成国家间的冲突，割裂民族与世界的联系。复杂族群、多元民族身份对国家外交的影响值得辩证看待：它既可能使外交左右摇摆，甚至一厢情愿地倒向一方，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丰富的族群、文化也能为外交增添转圜余地，为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提供外交资源。

在发展中拉关系过程中，拉美民族身份特点值得关注。中国外交应注意到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给其外交带来的摇摆特性，提前对相关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做好预案。同时，中国外交可以关注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多元特点，将生活在拉美各国的华人华侨作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中拉共同身份的抓手。尽管中拉双方历史迥异，但双方独特的民族身份建构过程都有别于西方，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特点，中方也可就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拉美方面进行学术对话和经验交流。

从理论层面看，本文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本文更多只是展现了通过民族身份理解拉美外交整体方向的理论可能，并较简略地阐述了民族身份影响拉美外交的部分机制。这些机制还有待更多、更深入的案例检验。此外，尽管民族身份深刻地影响了拉美外交，但并非影响拉美各国外交的唯一因素。在共同影响外交、塑造区域国际政治的过程中，民族身份因素与其他因素如何互动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 帅)